

推动文化交流 促进友好合作

——在第一届中日大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基调演讲

复旦大学校长 王生洪

(2006年12月9日)

尊敬的各位校长、各位学者，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这个即将辞旧迎新的时节，中日两国众多著名大学的校长和学者们，群贤毕至，令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荣幸。在此，我谨向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最真挚的欢迎和问候！

我与在座诸位中的许多人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自2000年东京大学举办首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以来，我参加了迄今的全部四届论坛，与许多大学的校长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天，我们诸多新老朋友又云集复旦，在中日大学校长论坛的框架之下，举办第一届中日大学学术研讨会。我真诚地相信，这必将进一步地促进和深化我们彼此间的了解与友谊，必将为中日两国著名大学之间——乃至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构筑一座新的桥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日两国有着频繁、深入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的经验，两国人民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曾先后向中国派遣了约17批遣隋使与遣唐使。在他们当中，有大

家耳熟能详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空海、最澄、橘逸势等著名人物。中国的鉴真和尚，历经六次东渡，终于在他 66 岁高龄并已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的陪同下，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鉴真一行受到了天皇为首的日本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轰动了日本全国。他在日本生活了 10 年，最后在日本圆寂。以阿倍仲麻吕、鉴真等人为代表的那些可敬的人们，为了两国的友好交流，不畏路途艰险，不惧惊涛骇浪，不惜付出生命和永别故土的代价。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的精神和贡献却永远为两国人民所敬重所怀念。2004 年以来，因当年日本留唐学生井真成墓志的出土而在日本和中国引发的“井真成热”，正是中日两国人民对中日文化交流先驱者们深切缅怀的一个反映，也是两国人民热爱与渴望中日和平友好之情的一个体现。

近现代以来，尽管中日两国关系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蒙上了重重阴霾，但是中日两国人民呼吁和平、渴望友好的愿望依然涌动不息。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中日关系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为改善和促进中日关系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力量，也始终在为一个睦邻友好的中日关系而不懈努力。我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就在我们筹备这个会议期间，今年 10 月 9 日，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后，两国政府在联合新闻公报中明确指出，中日两国要“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我认为，公报的这一宣示准确地揭示了中日关系的本质。尽管中日之

间有着种种矛盾和摩擦，但是中日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共同利益乃是不争的事实。在贸易领域，1993~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依然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日本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数据，2005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为65.7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12%，占日本海外投资的14.4%。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比例。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所提供的低成本生产和低价格产品提高了日本普通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为日本降低通货膨胀作出了贡献。至于在政治外交领域，中日可以合作的舞台则更大，共同利益更多。譬如，在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中日两国即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再譬如，在联合国框架中开展地区性维和活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众多问题，也都在相当的程度上依赖于中日之间的合作。因此，我由衷地相信，两国政府确立的这一崇高目标，不仅符合两国政府的共同利益，而且代表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呼声。

各位校长、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亚洲正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实际驱动力，过去五年，亚洲在全球实质GDP增长中的比重高达50%以上。即使以当前美元价格计算，亚洲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21%，已超过美国的19%。与此相联系，亚洲的迅猛崛起正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正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理应在这一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中日两国目前都正处于国家发展的最佳战略

机遇期和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谋求国家发展，是现阶段中日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实现上述崇高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断推进彼此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不断构筑和扩大共同战略利益，友好相处，合作共赢，乃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也是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应共同致力的一项崇高事业。

历史的经验表明，文化与学术的交流常常是国家之间友好交往的源头活水和强大推动力量。大学，作为传播文化和寻求真理的机构，无疑可以在促进国家、人民的友好交往方面发挥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大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缘因素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渊源，中日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中日大学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大有作为。

第一，大力支持学生的广泛交流。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友谊，是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的保证。因此，中日两国之间大学生交流活动的意义绝非仅限于学生培养本身。近年来，中日两国大学生交流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以复旦大学为例，近年来我们接受日本高校协议交流学生的数量始终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2005~2006 学年度复旦大学接受日本高校派遣的交流学生目前已达 46 人，占复旦大学同期接受各国协议交流学生总量的近 10%；同时，复旦大学选赴日本高校交流的学生也达 35 人，为近年来新高。但是，由于学分转换、奖学金金额与覆盖面、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制约，

中国学生赴日本交流的规模尚需进一步的大力推动。对此，我呼吁中日双方的大学应采取切实的措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便利，给予学生交流更多关注和支持。

第二，大力加强科研领域的合作力度。众所周知，日本的科技水平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日本众多的著名大学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前沿科学研究经验。正在实施之中的 21 世纪 COE 计划，是日本政府大力提升高校学科与科研水平的一项战略举措。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的大学要成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要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建设。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和众多著名大学的经验和举措值得我们认真借鉴。中日大学加强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两国科学家的成长和相互学习，有利于实现重大的科研突破，也有利于两国人民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第三，共同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目前，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增强高校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中日两国的高校都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大学的重组合并、大学自主管理、竞争性的科研拨款体制、推进国际化等。这些改革虽然面临着不同的背景，但也存在着许多共性的问题，有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譬如，日本正在推进的国立大学法人化就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双方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对话与合作，有助于推进两国高等教育界的深入了解和交往，有助于在各自学校乃至各自国度培育和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

此外，中日许多的著名大学都拥有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就

日本方面而言，京都大学有东南亚研究所，庆应大学有东亚研究所，东京大学有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东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有亚太研究中心，北海道大学有斯拉夫研究所，等等。同样，中国的北京大学有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院，清华大学有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南开大学有日本研究院，吉林大学有东北亚研究院，复旦大学则有以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和美国研究中心为主体的国际问题研究院，等等。而所有这些高校，都在两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方面的优势，积极发挥大学的影响，用大学的良知和教授们的睿智来为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呼吁鼓吹，倡导引领。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和平、友好、和谐、合作，是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是人类无数世代梦寐以求的永恒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和瑰宝。捍卫这些理想，维护这些价值，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既是大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大学的尊严所在。在中日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同处历史发展紧要关头、中日关系面临崭新机遇和挑战的今天，中日两国的大学，特别是那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大学，有责任、有义务、同时也应当有信心承担起推动和促进中日友好合作的重任，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共同发开拓崭新的境界。

尊敬的各位校长、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中日大学学术研讨会的首届会议选择在复旦大学召开，这充分表明了大家对复旦的信任，令我们倍感荣幸和鼓舞。我相信，在各位校长的热情支持下，在

各位学者的积极参与下，本届研讨会一定能够围绕“创新与合作——中日大学的新使命”这一主题展开充分的交流与讨论，一定能够收获大量极具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尽管我们的研讨会才刚刚起步，但是，我真诚地相信，只要大学的良知仍在，只要中日两国人民对和平友好的热爱仍在，我们的中日大学学术研讨会就一定能够在促进中日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而令人自豪的价值与作用。

谢谢大家。祝各位在上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